

北京违规群租屡禁不止,近日出台的新政:“每间不超过2人,每人不低于5平方米”恐成纸上谈兵

2居室住30人 违规群租难治

低收入群体需求巨大,监管部门难以入户整顿,房东房客共同隐瞒……导致政策治理效果有限

本报记者 北梦原

7月18日,北京住建委等多部门印发《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政策的出台对群租现象能否起到遏制作用?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目前不少小区仍存在大量不符合政策要求的群租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群租现象十分普遍。由于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床位有着现实需求,加上监管部门难于入户整顿,甚至房东房客共同隐瞒真实情况等原因,政策难以落实,治理效果有限,恐会沦为纸上谈兵。

位于北京市东三环的百环花园小区,是“传统”的群租“重灾区”,曾经屡次被媒体曝光。去年,当地街道办和派出所清理拆除400多套群租房。记者前往该小区采访发现,群租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在小区里,记者见到了湖南小伙常鹏,在他租住的这套不大的两居室中,满满当当摆着15张上下铺,住着30人,显然不符合“每间不超过2人,每人不低于5平方米”的政策要求。4年前,常鹏从郴州宜章县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京上学,被村里人视为“最有出息的人”。然而今年毕业后,常鹏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过老乡介绍,常鹏最近新接的“活”是替一个剧组“群头”招揽群众演员,但他现在并没有工资,要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才能拿到工资。

“我们这种人其实就是给‘群头’干活的杂工,和剧组没关系,不可能有宿舍。”为了工作方便,常鹏选择在东三环双井附近租房,但在昂贵的租金面前,他最终只能以600元租下了一个床位。和常鹏一起搬进群租房的,还有他的两位同学,与他一样都来自农村。

常鹏住的是一间20平方米的次卧,摆着4张上下铺,住着7人。除了一张下铺空着,其他床位都住得满满当当。一墙之隔,客厅加上封闭的阳台不到40平方米一共摆放了8张上下铺,住着16人。这里的床位收费在每月500元~700元不等。另外一间主卧上了锁,“那间卧室条件最好,只摆了3张上下铺,住了6个人,还有张小沙发,但租金也比其他的贵100多元。”

走过厨房时,常鹏提醒记者小声点,因为房东住在厨房里。“他住在厨房估计不想我们在这做饭。”他神秘兮兮地说,“而且他上个月还把厕所的门给拆了,用块布半挡着马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厕所,方便其他人同时在旁边刷牙、洗澡。其实就是把人赶到楼下商场去上厕所!”

除了4张上下铺,常鹏的房间还有1张桌子,1把椅子,1个架子,简单而紧凑。“大家都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箱子放在床上,所以也不显得挤。垃圾都扔厕所那边,这屋还算干净。”常鹏努力而勉强地向记者介绍着这间小屋的“优点”;“至少开空调不用给钱!房东每次来收空调费,我们都不给,他能怎么样?不然报警啊!他这房子是违规出租的,你说他敢

报警吗?”常鹏有点兴奋过了头,记者问他违规的房子为什么还要住,他很腼腆地笑了笑,“生活嘛,没人愿意住在这,都是没办法。”

睡觉,是这间屋子,这个床位对常鹏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没什么讲究。”但实际上,在群租的这半年时间里,常鹏没有几天能真正睡好。“我晚上睡得晚,每天晚上就听这满屋子人说话、磨牙、有喊叫的,有骂人的,还有叫救命的。”说到这里,常鹏叹了口气,重复念叨着“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突然表现得异常深沉,“我现在还一分钱都没挣到,估计以后挣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多元,600元的租金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不住群租房就只能走人,但我现在不能回老家,不能让人看不起。”

临走时,记者准备给这个贴满小广告的房门拍一张照片,常鹏赶紧提醒说,“记得给门牌号打个码。这段时间查得紧,房东他姑父的房子就被查了。”记者反问他不是很恨房东吗?他笑了笑,还是那句“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无力为自己找到一个在法规框架内的安身之处,却用这样一句提醒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与房东之间脆弱的契约关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农民工达到19.7%,总数超过5000万人,且比例逐年上升。居住条件比常鹏及其舍友糟糕者大有人在。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住建委,其相关负责人很无奈地向记者表示,政策出台后,其效果并不是一两天就能显现出来的,今后



为了租给更多的人,两居室的客厅也被“征用”,满满当当摆了8张上下铺,住着16人。本报记者 北梦原 摄

住建委将与多部门联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百姓居住权益。

对此,社会学专家分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工群体,为了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立足,不得不追逐更低廉的生活成本,这正是群租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因为消化能力有限,不得不以

高成本的方式进行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讲,群租只是部分低收入群体避免被淘汰的无奈选择。法律专家则认为,群租行为本质上并不违背《合同法》,但是给社会管理带来了问题,在加强治理、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应考虑如何将集中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提高城市的容纳能力。

南通又一批农民工享受经济适用房

该市将降低申请“门槛”,不断“扩面”

本报讯(特约记者王君东)8月1日下午,江苏省南通市农民工经济适用房抽签仪式在该市住房保障中心举行,又一批11位外来农民工选到了自己心仪的住房,即将成为“新南通人”。至此,该市先后已有38户外来农民工享受到了与城市居民同样的住房保障待遇。

据介绍,此次是南通市第三次举行农民工经济适用房抽签选号仪式,此前已有25位外来农民工选到了满意的住房,并均已入住。此次申请成功的13位农民工,有12位以“优秀农民工”身份提交申请,另有1位是缴纳社会保险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其中11人参加了当天的

抽签选房。抽签的房源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景河苑9户、林荫水岸2户。房源面积为78.77平方米~78.94平方米。单位房价均为每平方米3260元,总价为25万多元。所有房源均有配套车库,面积不等,单价不超过每平方米1750元。

幸运抽得1号选房顺序号的沈宝兰在众人注视下,选取了景河苑21幢804号房。沈宝兰夫妇都是南通市海安人,2000年到南通铁人公司打工,至今没换过单位。其间,沈宝兰获得过南通市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月薪加起来不超过4000元的沈宝兰夫妇,在此之前从没奢望过在市区买房,但“优秀

农民工”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报道,让他们看到了在南通安家落户的希望。尽管工作这么多年只积累了10万多元的储蓄,但沈宝兰表示选中的这套房价还能承受。选中704号房的如东县人严小兵有着和沈宝兰同样的感受:“南通商品房的房价对我来说,就像飘在天上的气球,只能看看,不敢多想。还好,我在南通连续缴纳保险已有十一年了,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报告被接受了。”严小兵来南通20年始终居无定所,已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

2010年5月,南通市出台文件,在全国

率先将“优秀农民工”和缴纳社会保险时间较长的外来农民工纳入市区住房保障范畴,使之享受与市区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保障待遇。市房管部门将每年市区经济适用房总量的15%,作为外来农民工的经济适用房房源。南通市总党组书记、副主席葛玉琴表示,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工作,该市工会、房管等部门正积极稳妥地摸索前进。去年再次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将“优秀农民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调高到上年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2100元,比上年标准提高了500元,降低“门槛”,不断“扩面”,努力让更多的外来农民工享受到这一保障待遇。

四川农民工打“飞的”回乡参加运动会

据了解,这次运动会根据农村实际,共设有拔河、跳绳、踢毽子、篮球、乒乓球、象棋、三人四足跑步、接力赛等8个项目,各村和乡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均组队或联合组队参加。当地职工群众也积极参与比赛,纷纷踊跃报名。许多农村妇女报名参加了拔河、跳绳、踢毽子等项目的比赛,文家坪村的农民工袁景伟、袁景轩两弟兄,为及时赶上篮球赛从广州坐飞机赶回家乡。比赛中,各支队伍奋力拼搏、团结协作,展示了白果乡农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经过历时三天的紧张角逐,机关队、文家坪队、白果坝队获得团体总分前三名,并分别获得3000元、2000元、1000元的奖金,运动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据悉,此次运动会得到了乡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大力重视和支持。乡政府向乡总工会划拨了专项活动经费补助,当地一些企业也为运动会提供了赞助,相关单位在工作人员、场地、器材等方面都给予无偿支持配合。整个赛事安排周密科学,后勤保障有力,确保了活动顺利开展。

乡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运动会既活跃了农村社会氛围和丰富了农民工文化娱乐生活,又提升了农民团结协作的意识,增强了群众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凸显了工会的作为而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盆浴”消暑防溺水

7月27日,在郾城县马头镇林子村,两名留守儿童在浴盆中戏水纳凉。

连日来,山东省郾城县持续高温天气,许多农村老人让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家中洗浴消暑,预防娃娃河塘溺水。

房德华 摄



高档娱乐消费场所里,有一个被人忽视的低收入群体——

京城部分“高尔夫球童”月薪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本报讯(实习生吕佳音)提起高尔夫球童,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常年在设施高档、环境优雅的高尔夫绿地中穿梭,紧随兴致勃勃挥杆打球的高尔夫运动者一起谈笑风生的轻松职业,然而在现实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竟然拿着不足最低工资标准的月薪,这样的工作甚至干就是很多年。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向高尔夫球童支付的月薪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该公司没有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球童们表示不满提出相应要求,并向顺义区信访办反映情况。对此,笔者前往该高

尔夫球场采访发现,该球场经历风波后已恢复正常营业,相关工作人员称,正与球童协商解决问,他们都已返回工作岗位。

据了解,该俱乐部80多名球童声称月薪1000元,持续了十几年。球童李女士介绍说,他们的基本工资按25元/天计算,除去节假日,每月全勤为26天,每人出场费为15元/天,平均每天一人能出1场~2场。若没有全勤的话,每天只能按18.5元计算。经计算,若每月全勤且一天出场一次,则每月的工资为1040元,低于1400元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球童表示每月1000元的工资根本不够生活成本,

而且,他们反映平时发工资时并没有工资条或其他通知单,均由部门经理口头宣布。

球童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并非个案。笔者在一家大型招聘网站上搜索球童招聘信息时发现,北京某高尔夫俱乐部招聘球童的年龄要求是18岁以上,月薪一栏则堂而皇之地标注“1000元以下”。据笔者统计,这家招聘网站一个星期内的高尔夫球童招聘信息中,除去工资面议的以外,标注具体工资的43家单位中有15家工资待遇显示为“1000元~2000元每月”,占总数比例的34%,而其他“工资面议”的工作中,底薪又占据多

少不得而知。

在北京市朝阳区另一家高尔夫球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洁人员称,她与很多球童都是外省来京打工者,球场负责食宿,但未与他们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休息日不定且没有加班费,她每月工资在1400元~1800元,不少球童还不如她。近两年由于工资始终不变,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她认为这样的工资已属勉强,还要在这微薄的收入中抽出部分寄回老家,实在是捉襟见肘。

对此,笔者采访了岳成律师事务所劳动

人事部的王律师,据他介绍,劳动者工资必须达到所在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在用工时必须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是维护自身权益首先要关注的基本前提。其次,明确责任,劳动者可通过两个渠道维护自身利益:一是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申请调解;二是到当地劳动局申请劳动仲裁,协商解决正式合同签订及补交劳动者工资等事宜。

【打工喜乐】

征文启事

广大读者朋友:
全新改版的《农民工周刊》已经于今年1月问世,并通过“为农民工中的中小企业赠阅《工人日报》”项目,向全国5.9万家中小企业免费赠阅,得以与更多的农民工朋友见面。我们期待来自您的反馈,倾听并传达您的声音,更好地为您服务,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理解打工者群体。为此,《农民工周刊》特开展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
“我与《工人日报》的故事”、“打工喜乐”。重点写一写赠阅《工人日报》给您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您的感受和期待。
征文要求:
一、选取一个侧面或事例,进行真实、生动、细致的叙述,切勿综合概述,流于表面。
二、不超过1500字,以第一人称为主。
三、发至grrbnmgzk@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征文”二字。
四、择优刊登并寄发稿费,请随信注明有效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
《农民工周刊》编辑部